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

朱 端 强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朱端强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4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7-101-04230-9

I. 万… II. 朱… III. ①万斯同(1638~1702)—人物研究②明史—
考证 IV. ①K825.81②K248.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775 号

书 名 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著 者 朱端强

责任编辑 俞国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frac{7}{8}$ 字数 295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230-9/K·1788

定 价 28.00 元

前言

—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崇祯十一年正月生于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卒于北京,终年六十五岁。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及门弟子,清初浙东学派重要学人之一。他自康熙十八年四十二岁时以“布衣”被聘入京,先后协助《明史》监修、总裁徐元文、徐乾学、王鸿绪等人纂修《明史》,直至去世,为《明史》修纂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时代、家庭和师友的影响下,万斯同从一个文学之士到明史专家,从讲求“慎独”的王阳明学派的信徒到笃信“实学”的颜李学派学人,从拒不仕清的明朝遗民故家子弟到清朝官修《明史》的主要纂修者。其充满矛盾的一生,是明末清初历史的产物,也是清朝第二代学人的典型代表之一。他自己晚年回忆说:

仆生平学凡三变。弱冠时为古文辞诗歌,欲与当世知名士角逐于翰墨之场。既乃薄其所为无益之言以惑世盗名,胜国之季可鉴矣。已乃攻经国有用之学。谓夫天未厌乱,有鹰图者出,舍我其谁?时与诸同人、兄弟自有书契以至今日之制度,无弗考索遗意,论其可行不可行。又思此道迂远,而《典》、《考》、《志》诸书所载,有心人按图布之有余矣。而涂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竟无成书,其君相之经营

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

创建、与有司之所奉行、学士、大夫之风尚源流，今日失考，
后来者何所据乎？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
祖不难以身殉，为其曾、玄乃不能尽心网罗，以备残略，死尚
可以见吾先人地下乎？^①

我们通过对万斯同生平的研究，大体可把他上述学术活动和思想发展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明末至康熙五年左右。

万斯同出身在一个和明朝历史相终始的世袭官宦之家。始祖万斌，元末随朱元璋起兵，以功授永平卫副千户，洪武五年征漠北而死，赠明威将军、指挥僉事。斌子锺，洪武二十八年授宁波卫指挥僉事世职，死于“靖难之役”。锺子武，征交趾死。武弟文，御倭寇死。此外，万锺的女儿义颢，在哥哥和弟弟死后，“守志不嫁”，泣血抚养万文的遗腹子万全成人。故世称万氏一门“四忠三节一义”。斯同的父亲万泰，崇祯九年举人，江南复社著名领袖，曾参与黄宗羲等人发起的联名驱逐阉党阮大铖的斗争，南明鲁王政权授官“户部主事”，万泰辞，“请以布衣视事”。江浙失守，隐居故庐，以屈原自居^②。但自万斯同懂事以来，这个家族正伴随着明朝的灭亡而急遽走向衰落。斯同的青少年时代正好在这种“国破家亡”的痛苦中度过。顺治二年，清军攻占宁波。斯同一家四处逃难，母亲和祖母先后死于战乱，家中藏书毁于兵火，故第被清军辟为营帐。父亲去世之后，家况更加萧条，兄弟八人，全靠躬耕和教书自给，随时处于饥饿的边缘。万斯同曾以万氏世代居处的“逸老堂”之兴废为题，生动地描述万氏家族明清之际的变迁说：

① 刘坊《天潮阁集》卷一《万季野先生行状》。

② 参见本书附录《万氏世传》。

万氏之居此堂者凡五世矣。当我祖之时，往来于此者大多拥车骑，盛冠盖，赏花钓鱼，笙歌交沸，此一时也。迨我考之时，胜友毕集，谈词如云，赋诗响答，声摇林木，又一时也。至我兄弟侣鱼虾，友麋鹿，樵夫牧笠皆得与我争席，而往日之风流都不可仿佛矣。则是六十年间阅万氏之盛衰者莫此堂若也。以盛若彼，以衰若此，吾兄弟之居此堂者得不愧于先人耶？吾祖若考两世皆一人，乃成就卓卓若此，今吾兄弟八人，反无一人克振其箕裘者。青毡失于偷儿，故第夺于戍卒，携妇若子，栉比以居，俯仰此堂，能无骨悚？此我兄若弟所以抚膺椎心而泣血也。^①

万氏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对万斯同一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铸就了他穷且益坚的个性。他认为“承家者在乎立身，而不在于富贵，立身者在乎诗书礼乐，而不在于显达”^②。他终身不慕荣华，持“名节”自励，以“布衣”修史，表现出令人景仰的人格。自幼对“异朝”和“异族”的仇视，奠定了他以明遗民自许和终身不仕清廷的思想基础。坎坷的命运和忧愤的思想曾激发万斯同去做一个文学家。这一时期，他常常跟随兄长们“出与郡中诸大家为文会”^③，讲论诗文，互相唱和，写下了许多抒发遗民失国之恨和抗节反清的诗文，如他在众多的诗句中把明亡喻为“赤日颓”、“金瓯变”，把清军斥为“腥尘”、“狼烟”、“豺虎”^④。万斯同的诗文具有浓郁的史学气氛和强烈的现实性，如组诗《鄮西竹枝词》五十首，以宁波地方历史典故为题，讴歌“忠义”爱国人物，斥

① 万斯同《石园文集》卷八《逸老堂记》。

② 万斯同《石园文集》卷八《逸老堂记》。

③ 万言《管村文抄内编》卷一《李重明墓志》。

④ 参见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一《述旧》、《述怀二首》等。

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

责奸佞卖国行为；又如《（明史）新乐府》六十八首，“采明室轶事而系之以诗”^①，被时人誉为“《明史》之前驱”^②。均表现出万斯同以诗系史才能。万斯同后来虽然弃文治史，但却一直对文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进入北京史馆之后，他常与著名诗人朱彝尊、查慎行、孔尚任等互有诗文唱和，曾专与著名诗人吴旻、李崢瑞等人讨论诗学问题。吴旻因著《答万季野诗问》、《围炉诗话》等，其中也包含着万斯同对诗歌批评的见解。他曾为李崢瑞、张贞、徐兰、汪文柏等人的诗文集作序，论及清初诗文，也颇有见地。

（二）康熙五年至康熙十八年左右。

康熙四年，万斯同入黄宗羲门墙之后，渐次觉得在百废待兴、民生凋蔽的社会里，“章辞之学”不足以济世救人。于是他决心放弃当文学家的念头，转而从古今制度中去探寻济世救国之策，“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作而行耳”^③，含有推翻清朝，光复故国之意。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万斯同更加刻苦地攻读经史著作。他先后到过当时江浙著名藏书楼云在楼、天一阁、传是楼等地读书和抄书。由于名师的指点和勤奋好学，万斯同以通晓经史、典章、地理、六书，乃至泰西推步之学，成为浙东地区年轻而渊博的学者。他常常参加地方各种“讲会”，倡导经世实学。

万斯同最初是王阳明学派的信徒，尤其崇尚“处幽独若处明廷”的“慎独”思想^④。这种思想强调个人意念的修炼，忽视客观

① 万斯同《新乐府·题词》。

② 李邕嗣《杲堂文抄》卷二《万季野新乐府序》。

③ 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与从子贞一书》。

④ （雍正）《宁波府志》卷二十五《儒林传·万斯同》。

实践和功利行为。刘宗周说：“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①这种思想使万斯同乃至整个黄宗羲学派的言行非常矛盾，他们一方面提倡研经读史，经世致用；一方面又怯于投身现实生活，趋于洁身自好，坐而论道的避世行为。万斯同和黄宗羲学派所奉行的“慎独”思想曾遭到当时慈溪学人潘平格的猛烈攻击。潘氏是清初与颜李学派“不谋而合”^②的反理学的思想家。他提出“朱子道，陆子禅”，旗帜鲜明地反对宋明理学。他强调躬行实践，济世救人，指责“闭户穷巷，独善于闲里”的避世行为是一种“绝不以天下生民为念”的残忍行为^③。康熙八年，潘氏到宁波讲学。此后，万斯同曾“往诘其说”，与潘氏当面辩论，结果却接受了潘平格的思想^④。所以，万斯同的好友郑梁说：“季野之学近宗梨洲，远溯蕺山，其于阳明固未尝墨守之也”。^⑤事实证明，潘平格的思想不但增强了万斯同反理学的观念，而且也是促成其改变隐居避世行为的一大动因。康熙十二年，万斯同、斯选兄弟积极参与由知府邱业组织的《宁波府志》的纂修。笔者认为，这是万斯同与政府合作的开始，也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跟从黄宗羲学习的过程中，万斯同开始侧重于史学，尤其是明代历史的学习研究，他首先对通史下过很大功夫。其学友黄百家说：“康熙丙午、丁未间（康熙五、六年），余与先生及陈子夔献读书于鄞县外之海会寺。见先生从人借读二十一史，两目

① 刘宗周《刘子全书》卷十三《中庸首章说》。

② 李塨《恕谷后集》卷十三《醒蠹文集序》。

③ 潘平格《求仁录辑要》卷五。

④ 参见李塨《恕谷后集》卷六《万季野小传》，《求仁录辑要》卷首毛文强《潘先生传》等。

⑤ 郑梁《寒村诗文选·五丁集》卷一《送万季野之京师序》。

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

为肿。”^①并开始补辑《历代史表》。康熙九年前后,他又在著名藏书家姜希辙家系统地阅读了《明实录》,“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②。也广泛阅读过明代众多的野史、家乘,结合父兄师友、故家遗老之闻见,进一步奠定了他全面驾驭明史的基础。这段时期,万斯同写下了不少读《实录》和野史的笔记,对明代历史和史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有的思想后来直接影响了《明史》修纂。入京前后,万斯同已成为全国知名的明史专家。如浙西史家潘耒称赞万氏精于明史说:“细大能默识,有触如倾盆。此学足名世,海内无其伦。”^③斯同北上修史,其师黄宗羲诗称“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④,学者郑重也说“天生季野,关系一代史学”^⑤,并非全是溢美之词。

(三) 康熙十八年至康熙四十一年。

万斯同进京之后,很快结识了颜李学派学人李塉、王源等人。修史之余,他常和这些人在北京的“碧山堂”、“江南会馆”、“岁寒书屋”、“梅花堂”等学者聚集处讲论经世实学。思想上进一步背离了“王学”,成为颜李学派的重要支持者和传播者之一。李塉写到:

自孔孟没而圣道邈然失传,陵夷汉唐,至宋明而歧途互出,佛老俗学,浸淫杂乱,(颜元)先生崛起,树周孔正学,躬行善诱,志意甚伟,而传闻不出里闾。王(源)子来学,渐播

-
- ① 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见钱仪吉《碑传集》卷一百三十一。
- ② 方苞《方苞集》卷十二《万季野墓表》。
- ③ 潘耒《遂初堂集》卷二《赠万充宗》。
- ④ 黄宗羲《南雷诗历》卷四《送万季野北上》。
- ⑤ 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见钱仪吉《碑传集》卷一百三十一。

海内。如吴涵、万斯同、王复礼……以名宦、闻人传布其说，而道日益著。^①

这一时期，万斯同学术成就达于鼎盛。除修史之外，他还完成了《历代史表》、《昆仑河源考》、《历代纪元汇考》等经史著作。同时，他又协助徐乾学编著了《通鉴后编》、《读礼通考》等书。在京期间，万斯同一方面与当朝名公大臣如李光地、王士禛、汤斌、吴涵、陆陇其等多有交往，称清廷为“本朝”^②，为当代清官廉吏作传，反清情绪有所减弱。但另一方面又始终以明朝遗民子弟自居，表现出执着的名节观，其思想和行为在现实环境中始终难于调和如一。

万斯同一生的交游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明遗民和前明故家子弟，其二是提倡经世致用和反理学的学者。

万斯同交结的遗民及故家子弟，大多直接或间接参加过明末抗清斗争。入清之后，他们又坚不出仕，以名节自励。这些人对万斯同的为人和“忠义”史观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如宁波著名遗民李邺嗣与万斯同交往最深，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邺嗣拒荐。次年，万斯同北上修史，邺嗣很不以为然，在给万氏送行之际，以东汉同隐弋阳山的郑次都和郅军章分道扬镳的故事相讽。全祖望认为，这是万斯同“终不受官职”的一个原因^③。明遗民及故家子弟熟悉明朝掌故，感“亡国”之痛，因而普遍关心《明史》修纂。他们在和万斯同的交往中，向万氏提供了许多有助于修史的事实。如福建上杭刘坊，祖父和父亲为明代云南地

① 李堪《恕谷后集》卷一《王子传》。

② 参见温睿临《南疆逸史·凡例》引万氏之语，万世标辑《万季野先生四明讲义》等。

③ 参见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编》卷十一《李杲堂逸事状》，李邺嗣《杲堂文续抄》卷三《送万季野北上序》。

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

方官，明亡，先后“殉节”，“全家八十余口同为灰烬”，刘坊流浪到京，与万氏相识，他熟知晚明西南史事，“于永历颠末，川黔事迹，谈之历历如在目前”^①，刘、万二人相聚数年，情投意合。又如北平王源与万斯同同事于《明史》馆，其父王世德为明崇祯“禁卫亲臣”，“熟悉先朝遗事”，曾著有《崇祯遗录》一书，此书录入史馆，万斯同看后觉得“甚有裨于正史”^②。同时，明遗民及故家子弟也把执掌史笔的万斯同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希望万氏能为他们的父兄说话，昭忠彰节，书之汗青。如黄宗羲把万氏视为“国史”的化身^③。著名遗民顾炎武、费密等皆因奉先人“忠节”行状入史馆与万氏叔侄相识^④，这也是万斯同在《明史》修纂中特别强调明遗民的历史地位和“忠义”史学思想的一大原因。

万斯同反理学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也与其交游有关。蠡县李塉是万斯同后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李著《大学辨业》一书，以《周礼》所言“三物”，即“六德”、“六行”、“六艺”，为古代庠序之“业”，反对理学家对《大学》一书的穿凿。万斯同读罢此书“击节称是”。并在该书序言中进一步批评程朱理学对“业”的解释说：“程子谓大学之道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既知为大学教人之法，何不即以‘三物’之教释之？而乃指之为‘穷理’。夫言学习‘三物’，则‘穷理’在其中，但言‘穷理’，则学习‘三物’之事或未实矣。”^⑤顺天刘献廷，其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以及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及岐黄者流，以及

① 参见刘坊《天潮阁集》卷首，李世熊《寒支初集》卷二等。

② 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王中斋先生八旬寿序》。

③ 黄宗羲《历代史表序》，见万斯同《历代史表》卷首。

④ 参见顾炎武《与黄太冲书》，《费燕峰先生年谱》等。

⑤ 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大学辨业序》。

释、道之言,无不留心”^①,万斯同“最心折献廷,引参《明史》馆事”,两人同室而居,思想十分投契。著名历算家梅文鼎不但通晓中西历法,而且还善于制作天文仪器。梅应邀入京参修《明史·历志》,与万斯同相交五载,“昕夕过从”。和梅的交往使斯同认识到西方历算“实可补中国所未及”,要修好《明史·历志》必须“兼通两家之学,而折其衷”^②。此外,著名考据家阎若璩也常和万斯同一起切磋古代礼制和地理问题。胡渭著《易图明辨》,曾问序于斯同,两人关于“河图洛书”的看法非常一致^③。地理学家顾祖禹,文学家孔尚任、戴名世、朱书、张贞、朱彝尊等也和万斯同有过学术或思想方面的交往。

万斯同史学活动和著述表明,其史学研究的重点在明史、补作旧史、学术史、考据学和宋季史五个主要方面。其史学萌生于明末清初的浙东地区,师承于黄宗羲。悠久的浙东历史文化传统;明末清初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宋学衰亡、汉学兴起的学术趋势,是万斯同史学形成的三大社会原因。关于万斯同史学的渊源和特点,笔者已有专文论及^④,兹不赘叙。万斯同一生著述很多,所涉及的学术面较广(参见1937年《建修万季野先生祠墓捐册》载沈昌佑撰《万季野先生遗著目录汇志》)。其著述大体可分为自撰和助编两类。自撰著作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有《历代史表》等十四种。其中《石园文集》、《石园存稿》、《石园藏稿》、《石园残稿》、《万季野先生遗稿》与《群书疑辨》为其诗文集,内容互有损益重复。只知梗概而其书已佚的有《声韵源流考》等三种。只知

① 全祖望《鮑埼亭集内编》卷二十八《刘继庄传》。

② 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送梅定九南还序》。

③ 胡渭《易图明辨》卷首万斯同《易图明辨序》。

④ 参见拙文《万斯同史学平议》,载《云南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

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

书名不详其内容的有《石鼓文考》等十五种。助编的著作主要有五种：助邱业纂成（康熙）《宁波府志》三十卷，已佚。助徐乾学编成《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原缺第十一卷）和《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今存；助编其八世祖万达甫著《皆非集》，今存。最后是争议颇多的《明史稿》（卷目无定说）。目前学术界尚未完全确定可信的《明史》万稿，因而我们还不能轻易将其作为研究万氏史学的材料。同时必须看到，有别于一般《明史》稿分撰者，万斯同一直处于《明史》监修、总裁高级“助理”的地位，其工作显然主要是协助监修、总裁发凡起例，统筹全书，在各分撰史稿的基础上再进行刊削加工等。因此，笔者认为，无万氏则《明史》无今书，但今本《明史》又实非万氏一人之力而成之。

二

《明史》是我国封建王朝主持修纂的最后一部“正史”，也是中国古代官修“正史”历时最长的一部史书。从顺治二年开馆修《明史》，至乾隆四十七年最后改定，著录于《四库全书》，再次颁布天下，首尾断续长达一百多年。其间又可大体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顺治二年至康熙十八年，《明史》之草创时期。

顺治二年，南明的历史尚未结束。是年五月，清政府便根据四川道御史赵继鼎的建议，开始设官修纂《明史》。这一时期，由于战事频繁，政局动荡，民族矛盾尖锐等原因，政府难能专心于此；而直接主持者冯铨、洪承畴、刚林、范文程等人不过是援例“监修”史书的官员，未能专司其事。纂修官郎廷佐、图海等人也大多非清代著名学人，因此，由于人才和资料相对匮乏，迄康熙十八年，《明史》修纂一直成效甚微。但这只不过是表层原因，

《明史》成书艰难的深层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忌讳”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一直困扰着《明史》修纂的整个过程。清初,为巩固政权,统治者更多注重的是支持新政权的“法统”原则,而不是封建“道统”原则,因此,朝野上下,有关《明史》修撰的“忌讳”特多,也特别敏感和危险,许多历史和史学问题也一时难于解决。尽管如此,这一时期《明史》修纂工作依然取得了一些成就。首先,政府曾多次下令收集《明实录》、邸报及民间野史群书等,为后来修史奠定了基础。其次,政府对某些“忌讳”问题也开始有了宽容的趋势,例如顺治十二年,汤斌上书言《明史》事,提出“今顺治元、二年间,尚有未达天心,临危致命,此与海内混一窃名叛逆者不同。宜下诏宽宥,俾史臣得免瞻顾”,得到顺治皇帝的赞同。又如康熙四年征集史书,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等。其三,留下了一些修史成果。由于有关这一时期《明史》修纂的资料太少,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切说明这一时期的史官们究竟取得了多少成果,但至少不能说是空白。直接的证据就有顺治九年,著名史家傅维麟分修《明史》,自称“所纂不过二十余年(史事)”,同时,他还利用修史之余私撰《明书》一百一十七卷。迨康熙十八年重修《明史》,此书仍为史馆所参稽^①。此外,著名学者钱谦益也曾短期任《明史》副总裁,他还私撰过《明史》(佚),其所著《明实录辨证》等文,对后来官修《明史》修纂也颇有影响^②。

(二) 康熙十八年至雍正元年,《明史》之基本完稿时期。

如果没有“三藩”之乱,《明史》修纂的进程也许会相对快些。

① 陆陇其《三鱼堂日记》。

② 参见徐乾学《憺园集》卷十九《修史条议》,刘承干《明史例案》卷二引王鸿绪《史例议》等。

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

“三藩”之乱和郑经入扰东南，不但打乱了清政府的日常工作，而且使政治局势又趋复杂和紧张。康熙十七年，平乱战争进入尾声，政治局势渐渐缓和，清政府及时出台了一项颇具影响的文化怀柔政策——征召“博学鸿儒”特科。与此同时，《明史》修纂工作又被重新列上议事日程。这一时期，由于清政权越来越稳固，康熙帝高度重视《明史》修纂，更为重要的是，政府通过征召“博学鸿儒”聚集了一批全国一流的学人，前后主事的昆山二徐（元文、乾学）、汤斌、王鸿绪等不但堪任史职，而且能够通过他们的社会关系广泛联系不少著名的在野学者参与其事。笔者还特别注意到，这一时期，《明史》修纂的不少主事者和秉笔者，其先人都多少与《明史》必须记载的内容（特别是晚明史）直接相关。因此，他们不但非常熟悉明史，而且更希望把他们祖先的宦迹忠节载入《明史》。作为政府方面，眼看江山日益牢固，也希望通过《明史》修纂（还有其他史志）一方面牢笼天下士人，一方面宣扬封建伦理和道统原则，从根本上维护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于是，两种原本对立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也极易在新的形势下互相让步，互相包容，逐渐趋于一致。

这一时期的《明史》修纂工作又可分为相互关联的两个阶段。

从康熙十八年到康熙四十一年，先后由昆山二徐、熊赐履、王鸿绪等实际负责，由万斯同等协助主编。基本程序是先由史官阅卷分班，按时序撰成草稿，汇总后再由各总裁、监修官刊定，陆续进呈皇帝审阅。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康熙帝认为“纂修《明史》事关紧要，更极繁难，若监修、总裁人少，恐或偏执私见，不符公论”，命扩大《明史》监修、总裁人数。同月十九日，正式增补勒德洪、明珠、王熙、李蔚为监修官，增补陈廷敬、阿兰泰、汤斌、王鸿绪、徐乾学、李振裕为总裁官。康熙二十二年，初步完

成万历之前的史稿。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昆山二徐又进呈“《本纪》七卷,《列传》十五卷”。康熙二十八年二徐被劾,准备离京,是年十一月,徐乾学奏称“正德、嘉靖两朝《列传》及《地理志》、《职官志》、《艺文志》今已脱稿”,并请将《河渠志》、《儒林传》、《文苑传》及其他在纂史志稿带归故里继续修纂完稿后,再“缴送史馆”。康熙二十九年昆山二徐离京后,万斯同为诸总裁所留,主要助王鸿绪裁定《列传》稿。这时,史馆旧人大多物故星散,《明史》修纂一度松弛。康熙三十三年,重召王鸿绪等来京修史。康熙三十六年,先后以大学士王熙、张玉书、伊桑阿、李天馥、熊赐履为《明史》监修官,以张玉书、陈廷敬、王鸿绪、张英等为总裁,分任专阅,纂修工作又复加快。

康熙四十一年,熊赐履进呈《明史》稿四百一十六卷。关于熊赐履如何修史和《明史》熊稿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明史》熊稿是康熙十八年以来史馆稿的改本,也是后来王鸿绪修史的依据。从各种记载看来,这个本子可能对昆山二徐及万斯同等人先期留下的史稿改动较大,朝野上下都不满意。尽管学术界从未发现和认真讨论过《明史》熊稿问题,但有一个本子值得注意,那就是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所谓万斯同《明史》四百一十六卷,清抄本,自嘉庆年间从都门书肆展转流入北图。北图馆藏目录导卡旧题“万斯同撰”(今《续修四库全书》本《明史》亦依此著录),但检读原书,均无署称万斯同编撰此书之任何痕迹。早年李晋华先生校读后指出,此稿与万稿既不相同,与王稿也不相同,“乃介于万稿与王稿之间者也,特为何人核定,则尚未能断定耳”^①,谢国桢先生断此稿为“康熙时初修四百一十六卷

^① 李晋华《明史纂修考》。

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

本也”^①。此稿不独卷数与熊赐履进呈稿吻合，内容削而不载南明三王史事，其史识既不同于前期徐、万之见，亦不类后来之王稿。笔者初步认为，此稿很可能就是经熊赐履改定的《明史》万稿，有待深入研究。

从康熙四十一年到雍正元年，主要由王鸿绪负责。王鸿绪是《明史》修纂的资深史官和功臣之一。早在康熙十八年，他就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参修《明史》。康熙二十一年，扩大监修、总裁人选，他又以内阁学士充《明史》总裁官。康熙二十六年，丁忧回籍。康熙三十三年，又被荐回京修史。康熙三十六年，奉特旨以《明史》总裁“董率分纂诸臣”。虽然如此，自康熙二十一年以来，他一直以总裁的身份主要负责《明史》的《列传》修订工作，终其一生亦未为《明史》监修官。《明史》熊稿进呈后，康熙帝非常不满。康熙四十二年，有专谕责问熊、王二人，称该书神宗之后记载多有不确，直令将“本朝兴兵之由”载入《明史》。康熙四十三年，又谕斥“今之史官或执己见者有之，或据传闻者有之，或用稗史者亦有之。任意妄作，此书何能尽善”。这时，万斯同和康熙朝第一批史官已先后去世。康熙四十八年，王鸿绪以原官解任回籍，首先对其所司之《列传》部分再次进行修订。康熙五十四年，交由其子进呈。次年，王鸿绪奉特旨来京修书。余暇，他又对《明史》全书进行修订。雍正元年六月，进呈《明史》全稿三百一十卷，即《横云山人明史稿》，又称《明史》王稿。它无疑是康熙朝《明史》修纂的结晶。

（三）雍正元年至乾隆四年，《明史》殿本之形成时期。

由王鸿绪个人进呈的《明史》稿一直未经“宸断”，故雍正帝认为“有明一代之史，屡经修纂，尚未成书”，遂于雍正元年七月

^① 谢国桢《晚明史籍考》。

下令重修《明史》。但我们注意到，雍正帝对《明史》修纂的关注实不如康熙和乾隆二帝，终其一朝几乎没有论及《明史》的谕旨。由于这一时期主要是在《明史》王稿的基础上继续完善成书，因此，整个修史的规模也远不如康熙朝，监修、总裁大多是援例负责，纂修官的整体水平不高，在野学人的参与也很不积极。但这一时期，《明史》修纂的主导思想和基本方法依然是康熙朝的延续。首先，《明史》修订的依据主要是来自康熙朝的“史馆稿”，又称“旧稿”或“王稿”。其次，从这时史官及在野学人有关《明史》修纂的言论看来，诸如主张以《实录》参群书、强调如实记载南明历史、表彰忠节人物等，依然是康熙朝《明史》修纂所关心的问题。其三，不少纂修官和康熙朝史官有着明显的学术传承关系。例如，时任《明史》总裁的张廷玉为张英之子，其父曾为《明史》总裁。王鸿绪去世后，其族兄王项龄曾为《明史》监修，他也是康熙朝硕果仅存的史官。又如，重要史官杨椿称其早年曾随父亲杨大鹤在京修史，尤谙康熙朝《明史》修纂之原委和章法，被目为这一时期的“万季野”。史官梅穀成即梅文鼎之孙，《明史》天文、历志，多赖其祖孙二人先后完成。史官陆奎勋为康熙朝史官陆燾之侄，早年曾随其叔父在京修史……由此可见，《明史》修纂的确凝结了几代学人的心血！

但这一时期《明史》修纂的进程依然很慢。从雍正元年到五年，由于主要纂修官意见相左，关系不和，修史工作几无进展。主要分歧或表现在当时两位重要史官汪由敦和杨椿之间。汪氏较为推崇《明史》王稿，主张据此尽快成书；而杨氏则认为王稿问题太多，主张用现有之书与王稿“细加讨论”，他一直对雍正朝《明史》修纂质量多有微词。但从实际执行情况看来，这一时期《明史》修纂的基础依然是王稿，内容和体例均无重大变化。从雍正六年正月开始，《明史》以“旧稿”（即王稿）为蓝本，分由汪由